

2018年，適值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敝刊誠邀海內外學者以此為題，撰文評論過去四十年中國社會的種種變遷，共瞻未來。

——編者

## 中國高校社會主義課程與思想改造

根據中國教育部印發傳達的〈高等學校馬克思主義學院建設標準(2017年本)〉精神，今天的中國高校紛紛開設了馬克思主義學院，力求全方位打造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學、研究工作，從而加強全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然而我們只需回溯一下中共黨史，就會發現這種做法並不新鮮。祝猛昌的〈滅資興社：反右後期中國高校的社會主義教育課程〉(《二十一世紀》2017年12月號)一文探討了反右運動後期，中國高校設置的社會主義教育課程對當時的知識份子起着怎樣的思想改造作用，並以北京的幾所高校為案例，進一步探討了這門課程的起源、經過和實施的方式，以及對於後來的歷史事件產生的影響。

反右運動時期，儘管北京各高校也組織了對右派份子的批判，不過效果並不理想，這也影響了毛澤東對當時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因此轉而將重心放在了改造知識份子思想、提高人民社會主義覺悟之上，這也使得高校的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開設成了歷史的必然。高校作為知識份子的陣

#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地，一直以來都是思想較為活躍、言論較為自由的領域，較難進行管束。祝文指出，在高校開設社會主義教育課程，其目的在於消除整風、反右運動中出現的不同聲音，尤其針對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

這種改造主要是將教員、幹部和學生下放農村參加生產勞動，通過身體的規訓從而實現思想的改造。此外，還使用了大字報、大辯論的方式，透過話語和權力的密切勾連，以權力排除某些話語，從而建構話語語境，確定話語規則，實現對人們思想的掌控，以消除不利於黨的領導的思想，提高人們對社會主義、對黨的領導及相關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解和認同。同時，課程還改變了傳統高校中教師教授為主的授課形式，並使用了專題報告和輔導的方式增加課程的豐富度，以有利於受教育者的接受。

最後，作者指出了課程帶來了利弊兩面，有利之處在於改進高校的工作，對於解決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問題具有重要的作用，增強了共產黨對高校和知識份子的領導和影響。這反映了共產黨在成為執政黨後，仍然沒有改變習慣於依靠政治運動解決

問題的手段，這並不利於民主、法制建設。同時，將知識份子下放參與農業勞動並不符合現代社會的分工，是對人才的一種浪費。建國後的知識份子始終無法擺脫被思想改造、不被黨和人民所信任，地位一再被貶低的境況。在反右運動之後，中國相繼發生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深刻影響共和國命運的歷史事件，各高校也被捲入其中，在這當中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開展和實施無疑起到了很大的鋪墊作用。

楊森 廣州

2017.12.15

## 轉型時代下的香港身份認同

林芬、林斯嫻的〈香港青年的中國觀：民族認同與學生運動〉(《二十一世紀》2017年12月號)一文，通過梳理1960到2010年代中文運動、保衛釣魚台運動和港陸爭議等三大領域的香港學生運動情況，試圖探尋不同代際的香港人對「中國」的態度、對身份的認同產生巨大差異的原因。

作者依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所得數據，由香港

青年群體產生民族認同危機的具體現象，切入對時代心態的解讀。作者採用「邊界機制」與「象徵性資源」的理論概念，強調「他者」的建構在民族認同的形成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伴隨歷史發展，「他們」和「我們」的邊界不斷產生變化，具體認同也呈現出動態發展。作者剖析三個領域運動的核心指向，將其調動的象徵性資源概括為種族、領土和文化。與此同時，在區分「他者」的過程中，學生在時代與民族認同的影響下，採用「有機型」或「志願型」邊界認同機制進行宣傳。反之，學生運動的結果又建構起相應的民族認同，循環往復中，二者形成一個交互系統。

文章着重理清不同歷史階段中香港人所指的「中國人」意涵如何變動，而「內地」與「大陸」兩個詞語的選用，又反映着主體的不同態度。作者最後提出，邊界機制在民族認同的建構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民族認同危機並不是由身份本身所導致，而是自身認知與社會現狀脫節，或不同族群採用不同邊界機制時才出現的。

文章對各個事件脈絡的整理敘述清晰，對理論的運用得心應手。但也不得不指出，作者在論述過程中，「學生群體」與「青年群體」兩個概念常被混淆，特別是作為本文研究對象的「學生運動」，貫穿全文，若隱若現，卻始終未有明確劃定。作者認為當下香港青年的民族認同危機折射出港陸雙方在象徵性資源和認同機制上的偏差。另外，從上世紀60年代到2010年代的巨大時間跨度中，60年代的青年成為今天青

年的祖輩，身份的傳遞、新舊的交替也使得「香港青年的中國觀」具備了更豐富的層次。如何在轉型社會下的民族認同問題上尋找平衡點？也許這篇文章能夠引發讀者一些思考。

嚴飛 北京  
2017.12.18

## 對秦暉先生「十月革命」觀點的回應

近日秦暉先生發表的〈1917年俄國革命的歷史坐標〉（《二十一世紀》2017年10月號）一文，提到了本人對秦暉夫婦關於「十月革命」觀點的批評，筆者覺得有必要作出回應。

第一，秦暉夫婦在其關於俄國革命的文章裏，並未提及包括頓河哥薩克在內的「十月革命」後、立憲會議被解散之前的那些叛亂。秦暉先生的所謂「過去也都論述過」（頁12）沒有依據。

第二，關於1917年2月到10月之間的俄國工人運動：現在已經知道，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間，俄國尤其是兩個首都工人組織的工廠委員會奪取了工廠的經營管理權力；同時，絕大多數工廠委員會的領導幹部是布爾什維克。這就是秦暉先生所謂的「不得人心」（頁12）嗎？十月革命「得到了大多數彼得格勒工人的歡迎」（參見Stephen A. Smith, *Red Petrograd: Revolution in the Factories, 1917-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50, 209)。由於篇幅關係，筆者無法一一引用，但是這顯然駁斥了秦暉夫婦的觀點。

第三，關於施略普尼柯夫（Alexander Shlyapnikov）。秦暉夫婦為甚麼要以他們並不認同的蘇聯的評價作為依據呢？施略普尼柯夫以及奧爾洛夫（Kirill Orlov）、基謝廖夫（Alexey Kiselev）等從事工人運動的布爾什維克已經說明秦暉夫婦觀點的錯誤。1917年2月28日，彼得格勒蘇維埃創立了工人民兵，具體執行者正是施略普尼柯夫。工人民兵遍及全俄，施略普尼柯夫及其同事也發揮了相當作用。4月29日，彼得格勒維堡區蘇維埃創立了赤衛隊——亦即「十月革命」的主要執行者，施略普尼柯夫此後也成了其領導者之一。這就是秦暉夫婦視為「無產階級專政」標準的民兵組織。4月23日，彼得格勒冶金工會成立，施略普尼柯夫當選為中央委員會成員之一。6月底、7月初，全俄冶金工人工會成立，其中央委員會裏有包括施略普尼柯夫在內的四名布爾什維克等。難道這些工會和工廠委員會的態度不能代表當時俄國工人的態度嗎？10月16日，施略普尼柯夫參與了布爾什維克做出發動起義的決議的會議。10月25日，施略普尼柯夫召集了彼得格勒冶金工人工會特別會議，其決議呼籲冶金工人「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口號下聯合起來」。同時，該工會還從其基金中撥出了五萬盧布給彼得格勒蘇維埃。施略普尼柯夫的這段生平足以駁斥秦暉夫婦的觀點了。

葉攀 廣州  
2017.12.16